

从图书馆工作角度谈文献

——顾廷龙、李希泌两先生的一次对话

(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上海顾先生寓所)

李希泌(下简称李) 现在关于文献的界说,文献学研究的对象、范围、性质,众说不一,今天想请顾老谈谈这些方面的看法。

顾廷龙(下简称顾) 关于文献问题,我看了许多东西,感到“文献”这个词,现在用得广泛,这在以前是没有的。现在,我只能从图书馆工作的角度谈一些对文献的体会。

“文献”一词,始见于《论语》。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”最早用“文献”作书名的是宋末马端临,他写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叫作《文献通考》。他给“文献”下的定义是:“引古今史谓之文,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。”

文献学的范围应是哪些东西?我认为:凡是《文献通考》中所收集的东西都是。《文献通考》全书分二十四门:田赋、钱币、户口、职役、征榷、市采、土贡、国用、选举、学校、职官、郊社、宗庙、王礼、乐、兵、刑、经籍、帝系、封建、象纬、物异、舆地、四裔等。因此文献学接触到的历史和范围是很广的。当然,现在“文献”这个用语使用得比我们所说的范围还要广,我们现在谈的是从古典文献这一角度出发的,用“古典文献”,这样比较明确一点。所以,将来《文献》上要标明哪些是属于古典文献的东西。古典文献,在解放以前称之为“国学”,

所以曾有过一个国学图书馆，表示与专收新书的图书馆有一点区别。过去称之为国学，现在我们叫作古籍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古典文献。

在文献学的范围上，还有一个文献资料问题。文献和文献资料还是有区别的。书本中有文献和文献资料，但是有的文献资料并不属于书本的。比如我们馆（按：上海图书馆）收了很多鱼鳞册，都是明末清初的。它有两种：一种是地主家的，记录田地多少、方位等；一种是官府的，记录田地分布、田赋分配等等，这就不属于一般书籍，而属于图籍资料，它也是一种文献资料。抗战时期，日本人大量收集鱼鳞册，他们要从中了解江南农村的地理情况，特别是道路、桥梁的分布。这是出于军事的需要，为了要侵略我们。所以，文献资料的使用是多功能的，怎么利用，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又比如这张图（按：顾老模写郑大鹤所拟“学宫植园修治计画图”），所绘的是苏州学宫一个植园，这也是一种文献资料。将来，如果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，就可以编撰成书。还有尺牍，亦称信札，也是一种文献资料。比如编《时务报》的汪康年，他和师友往来的信札，原是单张的、前人虽曾编排次序，但易于散乱，我们花了大约两年时间装裱成册，就成了书了。现在又加以抄写，标点一下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，这就同单张、散乱的原始资料不同了。所以，图书馆应该重视这些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。可以利用的，印刷出来使用就广。图书馆一般是读者上门看书，所以人数有限；假使能整理印出来，既可播之远方，也可传之久远。这对于原始资料来说，本身保存得好自然好，如果保存得不好，也还可以有印本。所以我主张能够尽量地把资料整理编排影印出来。这种资料，就是文献资料。为此，我曾劝古籍出版社印稿本丛书，稿本是原始资料，着重在没有发表的，都是亲笔的，有修改的，要照原本影印。比如《四库全书》底本的《三朝北盟汇编》，可以看到四库馆臣删

改的原貌。

我对文献资料范围起初也不明确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采购工作，在邓之诚、郭绍虞、容庚、顾颉刚诸先生的指导下（他们是收购委员会委员）、通过实践，逐步认识的。顾颉刚先生在民国十六年（一九二七年）为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购图书资料，编写、出版过一本题为《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》。他指出：“以前收集图书，目光所注，至为隘狭。例如西汉《七略》不收当代律令，清代《四库》不收释、道二藏及府县志等。”他提出“要能够用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，能够用了搜集材料的观念去看图书馆的事业。”因此，“要把记载自然界和社会的材料一起收来；无论什么东西，只要我们认为是一种材料就可以收下，不但要好的，并且还要坏的。”他肯定了当时北京大学研究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的做法：“例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里，于普通书籍之外更蒐罗明清的题本和报销册等十余万件。历代的碑碣拓本和佛像照片一万数千种。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分为两部，一是图书馆，一是文献部。文献部中，如图画、照片、墨迹、档案，以及各种表示宫廷历史的器物都陈列在内。”他本着“搜集材料”这个宗旨，拟具了十六方面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，计有：

- （1）经史子集及丛书；
- （2）档案（包括诏令、实录、国书、奏章、告示、会典、方略、则例、报销册、统计、表册、公文公报等）；
- （3）地方志（包括一统志、省志、府州志、县志、乡镇志、山水志、寺庙公院志、地图、地方调查表等）；
- （4）家族志（包括家谱、族规、家训、祖先图、世德记、氏姓考等）；
- （5）社会事件之记载（包括报纸、杂志、报告、传单、章程、纪念册、人名录、某一事件之专记等）；
- （6）个人生活之记载（包括日记、笔记、手札、讣闻、哀启、寿文、輓诗、传文、节考录等）；
- （7）账簿（包括商店之取货簿、营业簿、货价单、工厂之物料簿、工资簿、田主之收租簿、完粮簿、公共机关之徵信

录、家庭和个人的伙食簿、杂用簿、以及婚丧喜庆的用费簿、礼物簿等)；(8)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(包括满、蒙、回、藏、苗、僮等民族之书籍、经卷、公文、金石文字拓本，及记载其语言历史之书等)；(9)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(包括各种方言之新旧约，宗教学书、历史书、科学书、定期刊物、报告等)；(10)宗教及迷信书(包括佛书、道书、善书、神道志、神像、符咒、卜筮书、星相书、堪輿书等)；(11)民众文学书(包括小说、故事、戏本、弹词、鼓词、摊簧、杂曲、歌谣、宝卷、诙谐文等)；(12)旧艺术书(包括医书、乐谱、棋谱、法帖、画谱、图案画谱、游戏书等)；(13)教育书(包括旧式儿童读本、科举用书、历年新式教科书、各学校讲义、课艺、试卷、报单、文憑等)；(14)古存简籍(包括商代甲骨、周秦汉竹木简、汉魏以下石经、六朝以下写本书、宋元明初刻本书等)；(15)著述稿本(包括未刊之著述稿、已刊著述之原稿、改稿、印刷样本等)；(16)实物的图像(包括记载性的图画、照片、金石拓本、留声片、影戏片、幻灯片及模型等)。关于顾颉刚先生的购求计划书曾在《文献》第八期上发表过。这十六个方面对文献资料涉及范围的说明是比较全面的，也就是现在所谓记载有历史价值的都是文献。他在半个世纪以前已有所见了。我们收集资料的范围大抵不出乎此。所列十六个方面，好象范围很广，但是真要收集很不容易。一般人家不会保存这么多的东西。比如说《申报》吧，当时出版发行数量决不是很少的，但是现在保存得比较全的只有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份了。可知保存流传之不易。我认识文献资料，大概也是根据他的购求计划。起初，我们对这些琐碎的文献资料怎么使用法，有什么作用，不大懂，后来从说明中得到启发，觉得很有意思。

的确，文献资料包括的方面很多，比如由潘景郑先生收集、整理、保存的汪鸣銮受馈帐册，后来并经冒鹤亭、张元济、顾颉

刚先生加以题跋，张元济题署为《廉泉录》，从中可知当时京官清贫，依靠亲友门生资助的情况，这便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足备清季京官的掌故。可见零星记载，具属史科，其作用就看保存者与参考者之怎样处置了。又如革命文献中有许多传单，像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发的传单、宋教仁被刺后发表的传单等等，这类资料虽然我们也收集保存了若干，但还没有很好地整理出来。

1931年10月书友郭石麒君收购了嘉兴沈氏藏书，其中有门簿一册，以为无用，但我认为可作史料，因承见赠。这册门簿是封建社会官场的遗物，可以看到酬应的一些礼节。因此特请当过京官的熟悉情况的张元济、冒广生两位老先生写一段题记，不致后人看了无用。有这两位身历其境的老先生写了题记，使它成了珍贵的文献。张先生说：“京官宅子之门簿，阁人每日来访之客之姓名住址及来访之原因，或见或否，有时并及其官职及与主人之关系，以备酬答之用。”冒先生说：“中国礼俗尚于往来，老辈于寻常宾客若过五日不答拜则谓为不敬。此门簿之设之由来。而于婚丧祝寿尤极重视，不通庆吊者等于绝交。”又说：“往时京朝官往还率皆师生、同年、同乡、世交、亲串；无故而奔走权门者，有之，则众目为钻营。”这种情况，恐怕所谓正书中是找不到的。

1955年秋，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废纸，约二万担左右，我们组织了六个人从中挑选有用的东西。怎么挑法？首先，要订出取舍标准。标准怎样定？我们考虑图书馆应该从保存的角度出发，否则是无法下手的。古时有叶公好龙，但叶公见了真龙，奔而还走，失其魂魄，五色无主。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。今天文献资料在废纸包里，要能识别，挑选应加保存的东西，也就是看你是真“好龙”还是假“好龙”了。我们挑出了2,000斤，其中有明代民间用书《万宝全书》、讣闻、哀启等。在挑选过程中有一书为明张铨撰《国史纪闻》，有三位同志各拣得一册，共得三册，缺一册，感到遗

憾。后经一位同志回忆，他亦见到一本以为残而无用，仍把它丢了。这一例子说明熟悉古籍者所见相同，不熟悉的，弃之如敝屣。总之要实践出真知，不能象叶公的好龙那样。

李： 顾老刚才谈的文献和文献资料概念、涉及范围十分广泛。具体联系到我们的刊物，准确地讲应当如顾老指出的，是古典文献。现在一般人说的文献，也包括了外国的科技等等，那是广义的文献了。这种广义的文献，是翻译的名称。英文LITERATURE，是指图籍，又指文献。所以在外国，文献与图籍是不可分的。

顾： 广义的文献，是翻译的名称。文献同图籍分不清，我们也分不清，文献资料一经整理并加以说明，便成书了。广义文献的概念、范围是比较广的。讲文献学，教学生，总要讲得宽一点。我们从图书馆的角度收集资料，与他们有些不同。

李： 刚才顾老说文献资料集中整理便成为专书，所以文献资料同书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。看来，文物、文献资料、文献（包括广义的文献和狭义的文献）和书，都是既联系又区别的。比如，有些金石器皿是属于文物；青铜器中的铭文一拓出来，就成了文献资料了。

顾： 文献资料贵重的、珍贵的，便是文物。例如信札，如宋、元、明人的信札便算文物。又如郭天锡的《日记》，大部份在我们馆，有影印本书；但有一小部份散佚了，是从整本中散出去的，北京有几张，山西也有几张，他们摆在书画里，便成了文物。青铜器实物在博物馆，自然是文物，铜器铭文的拓片，又是文献资料。文献资料是分散的，零碎的，未经整理的，比如封建时代的讣告以及生活中的零碎的东西，像登科录、殊卷等等都是资料。如果是完整的原本，便是文献，登科录原本便是文献。文献资料经过集中，整理并加以说明，它同文献一样，刻印出来就是书了。青铜器铭文拓片，我们把它装订成册，印了出来也就是书。所以，文物、文献资料、文献、书，有区别，又有交叉。书，不

算文献，但包括了文献，书中有文献资料。比如墓志铭，单张的石刻拓片是归到金石里头去，编印入《碑传集》就成书了。编纂碑传时，先要搜集资料，有的是石刻拓本，有的是抄写的文章。

李： 看来这四者的关系有分有合，互相穿插的。现在的文献学，恐怕很多是边缘学科，如历史文献学、天文文献学、地理文献学、中医文献学等等。

顾： 的确，现在范围越来越广，门类是越来越多了。因为一个专题确立之后，就要把有关的方面摆进去。其中最容易接触到的是传记，现在还没有人正式写一本传记资料学。传记资料，比如刚才讲到的殊卷呀，同官录呀，同年录呀，这些都是传记资料，是顶好的材料。传记学还没有人搞过。我于一九四八年在暨南大学兼课，便想讲传记资料。传记资料也可以说是传记学的一个内容，因为一个学科得先有资料。传记学同文献学交叉，但也能分，它以传记为研究对象。文献学包括的范围广，传记学是其中的一个部分，一个门类。

李： 同学录、搢绅录、职官录等都是传记学的资料，应该说范围是很广的。传记学可否属历史文献学？因为上述资料涉及历史。

顾： 可以算。因为研究历史离不开人物。比如天文学史，涉及到天文学家；中医文献学，医学方面的人物也得摆进去，甚至病例里也有涉及人物的；所以统统离不开人物。传记学有助于解决历史问题。比如某一事件牵涉到多少人，这里头相互的关系，也有个“关系学”的问题。潘光旦研究过家族关系，出了一本书，他收集家谱，收集的资料也很多。以往我主持上海合众图书馆馆务时，收集了大量殊卷。殊卷上详列卷主的家世。有一次，叶景莘先生要写熊希龄先生的传略，但对熊的家世不详。他来问我。我从熊的殊卷中查到了熊的详细世系，答复了叶。叶很满意。殊卷的史料价值是很高的，是传记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资料。

李： 今天顾老谈了涉及文献的许多问题，还提出了建立传记学

学科问题，是具有创造性的，是很重要的，可是现在还没有人注意这个问题。《文献》开辟了“古代科技文献”专栏，介绍我国古代科技史文献；现代的、近代的、外国的科技都不搞。还准备辟“北图藏台港期刊有关文献研究论文要目”栏，报导台港学者有关文献研究的信息，还希望顾老多提意见。

顾： 互通信息，这是很好的。

（林其铨整理，并经顾廷龙、李希泌两先生审阅）

《史记》校考一则

《史记·高祖本纪索隐》：“又《系本》篇言姓则在上，言氏则在下，故《五帝本纪》云：‘禹姓姒氏，契姓子氏，弃姓姬氏，是也。’”

按：以“禹姓姒氏，契姓子氏，弃姓姬氏。”证《世本》“言姓则在上，言氏则在下。”则成了“禹姓，姒氏。契姓，子氏。弃姓，姬氏。”是为不妥。首先，司马贞误解司马迁原意，《五帝本纪》原文：“帝禹为夏后而别氏，姓姒氏。契为商，姓子氏。弃为周，姓姬氏。”此句意为：禹，姓姒氏。契，姓子氏。弃，姓姬氏。不可解为：禹姓，姒氏。契姓，子氏。弃姓，姬氏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：“太史公曰：禹为姒姓，其后分封，用国为姓，故有夏后氏、有扈氏、……”《殷本纪》：“契为子姓，其后分封，以国为姓，有殷氏、来氏、……”是证禹、契分别为姒、子姓。另外，古代先有姓，后有氏，由姓而演出氏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集解》：“姓者，所以统系百世，使不别也。氏者，所以别子孙之所出。”禹为姒姓，契为子姓，弃为姬姓。非有“禹姓，姒氏。契姓，子氏。弃姓，姬氏。”之说也。再者，《世本·氏姓篇》的格式未必如司马贞所言那样，清儒秦嘉谟在所辑《世本》卷七讲：“其所云上者，即一姓之左，备列诸国书，书引《世本》，如任姓，谢章薛吕舒祝终泉毕过之类是也。其所云下者，则诸国之下，罗列众氏，诸书引《世本》，如子襄氏齐桓公子子襄之后之类是也。”梁启超在《中国文化史·姓氏》云：“古者姓氏异撰，《世本》曰：‘言姓则在上，言氏则在下。’盖自述其作谱之例，以姓列上格，以氏列下格也。”若以“禹姓姒氏”之类即为《世本》格式，则不敢苟同也。

• 王玉德 •